

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

〔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00
01
04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

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论 官 僚 主 义

〔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王 绍 兰 高 德 平 译

ERNEST MANDEL
Zur Theorie der
Übergangs Gesellschaft
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Publikationen (ISP), Hamburg
根据西德国际社会主义丛刊社德文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

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论 官 僚 主 义

〔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王绍兰 高德平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印张 63,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9,500

书号 3001·1815 定价 0.33元

(只限国内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年出生于比利时，曾是比利时社会党党员，后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

《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原是“第四国际”西德支部的理论刊物《国际》（汉堡国际社会主义丛刊社出版）的一期专号的标题，其中除《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外还包括两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我们略去未译；《论官僚主义》则是国际社会主义丛刊社的一套理论丛书中的一种，出版于1976年。《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是曼德尔1967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革命五十周年（1917—1967）”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他根据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建设经验的研究，从理论上论述了诸如市场、价值规律、计划、投资和消费、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一长制和工人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在《论官僚主义》中，作者提出了在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干部蜕化为官僚的问题是否不可避免，追溯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和考茨基、托洛茨基等对这个问题的论断，分析了苏联、东欧国家官僚特权的基础等等。两文不仅涉及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也涉及到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实际问题。曼德尔的这些观点代表了“第四国际”的政治思潮。

曼德尔是所谓“第四国际”的一个著名“理论家”，也是国际论坛上的活跃人物。为了便于我国理论界了解、分析此人和当前“第四国际”的一些观点，我们把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用《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作为书名出版。

目 录

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	5
市场范畴的残存和消失	7
社会主义计划和价值规律	11
是死板的还是灵活的计划	14
投资和消费	17
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	19
一长制还是工人自治.....	21
个体的和集体的农业.....	24
自给自足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	26
工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29

论官僚主义

原编者前言.....	35
一、官僚主义的基本概念	38
1. 官僚现象产生的历史.....	38
2. 部分成果辩证法	40
3. 官僚特权	42

4. 工人国家的官僚化	44
5. 几种错误的解决办法	45
6.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	49

二、对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问题研究的历史经验

1.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	52
2. 考茨基的比较	53
3. 托洛茨基与列宁在有关党组织的设想问题上的论战	55
4. 罗莎·卢森堡反对德国工会官僚的斗争	56
5. 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所作的说明	60
6. 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工人国家蜕化变质的理论	62
7. 古巴革命	65

三、工人国家里的官僚主义

1. 过渡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	68
2. 工人国家里官僚化的起源	71
(a) 布尔什维克党内禁止宗派存在	74
(b) 实行“一党制”的原则	75
(c) 企业中的盈利原则	75
3. 工人国家中官僚主义的实质	78
4. 在工人国家里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81
5. 官僚是社会阶层还是阶级	82

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的经济建设问题，除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以及一些书信中零散地提出几个一般性的论证外都没有系统的看法。这肯定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能得出结论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认为，为未来社会创造一个完整的样板不是他们的任务，因为那个社会只能是产生那个社会条件的具体产物^①。

尽管人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但也不得不表示遗憾。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必然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这种过渡还会在不同的“关键国家”同时发生。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崩溃已在工业较落后和资本主义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开始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一种新社会的产生就用新的矛盾取代了原有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被发达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取代，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还不适应进步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过渡社会的先锋队不能只集中力量

^① 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至于凭空推想未来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从研究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出发，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旧社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8页）

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而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本身。一个或几个较落后国家的孤立革命所造成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使马克思曾经只能隐约看到的这种新矛盾尖锐化了^①。

要根据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系统分析过渡社会的普遍性，只有在这种经济已具有成熟和巩固的形式时，才有可能^②。未来的历史只把苏联目前的经济看成是这种形式的经济，而不顾其他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几乎又有可能从所有这些国家的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经验当中得出几个经济学的结论。另一方面，把这些经验总结为过渡时期的一般经济理论，假如是可能的话，也是太早了。这不仅是由于目前还不具有这种经济的发达形式，而且还因为人们很难确定这种经济在落后国家出现的特殊历史关系。

任何企图在十六世纪英国和荷兰式的手工业基础上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理论都失败了。重农主义者力求在法国这一基本上仍是农业国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一般的经济理论，他们的不幸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这种农业为先进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只有当资本主义在几个先进的无需实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③的国家里被推翻后人们才有可能对这种社会类型的经济职能进行分析，在此之前必定缺乏一个过渡时期的一般经济理论。但是，对当前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系统的

① 他在自己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到了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社会官僚化的危险。

②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的著名章节，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章中所指出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一种社会方式，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以后，“具体劳动”有可能转换成“抽象劳动”，转换成一般做为创造财富的手段的劳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2页）

③ 我们从斯米尔诺夫那里得到的两个概念头一次被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得到极为详细的阐述。

分析是有用和必要的。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这种分析有助于对面临或将要面临同样现象的革命力量进行政治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种分析引导我们对经济历史的新篇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时，既摆脱了纯粹的迎合潮流的观点，又避免了教条式的辩论。

下面谈谈一系列客观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发达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和社会的推动力。

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

第一个客观问题就涉及到第一次世界性革命出现低潮后（1921—1928），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那次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困境。必须准确地表述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因为斯大林式的篡改造成了许多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混乱现象似乎也延伸到愤怒的反斯大林分子的身上。

显然，以极左形态出现的宿命论和考茨基式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是始终都存在的，对于他们来说，世界革命出现低潮（即使不是完全失败）就只能意味着苏联将向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倒退^①。

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在一国没有建成的可能变成了没有开始的可能。从那时起，这一理论的代表并没有显示出非凡的能力，对标志苏联经济的动力和矛盾性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企图把标志苏联经济的动力和矛盾性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① 在潘涅库克推动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波尔迪加曾坚持这样一个论断，认为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后重新恢复资本主义。这种理论不是别的，而是仇视十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奥托·鲍威尔的思想一个直接的分枝。

基本矛盾，以及用国际阶级斗争总的概念使这种分析完整化。如果从荒谬的前提出发，认为中国革命意味着战胜了资本主义，或认为越南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那么就很难理解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联的左翼反对派从未抱有过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更不用说国际左翼反对派或由此而产生的托洛茨基世界运动了。对他们来说，反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就是从根本上反对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和机械论的变种。他们认为这归根到底就是对抗性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它将决定着由于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孤立而产生的问题。因此，正是反对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神话的这些同志是第一批提出加速苏联经济工业化和迅速实现集体化经济纲领的人^①。左翼反对派进行的一场斗争是为了制止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通过策略上的错误建议和错误的战略、或通过不能允许的、把各国共产党的政策置于不断变化的苏维埃外交需要之下的做法，阻碍世界革命向前发展。这场斗争与他们立即开始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坚定主张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正相反，这是同一个根本战略的两个方面。当左翼反对派认为，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外国也是不可避免时，他们就想通过苏联和国际上无产阶级力量的特殊性尽可能为这一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历史宣判他们是对的。认为在阶级之间玩弄伎俩可以永远防止爆发敌对社会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的主张还未被经验所证明。不仅和富农的冲突而且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党折衷主义的目光短浅的政策只导致这种冲突以粗野

^① 托洛茨基1923年在《新方针》中就已经同时主张回到议会民主并执行加速的有计划的工业化。

的形式爆发。预言这种冲突的人提出的警告未受到重视，针对取得最好的战略地位所制订的措施没有及时贯彻^①。

从历史的观点看，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失调、畸形发展和最尖锐的矛盾才能彻底解决。当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或一批工人国家希望取得这一革命的胜利时——胜利的无产阶级一定有兴趣采取一切手段迅速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国家不能满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暂时解决，并等待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它必须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是防止本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影响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不断革命理论提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或一小批落后国家取得孤立的胜利后应做些什么的回答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它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世界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市场范畴的残存和消失

十月革命一胜利，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共产党的理论家把社会主义建设解释为首先是市场和货币经济的立即全部消失。在德国，各种经济学家在讨论实行经济社会化时也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它与德国革命初期阶段、特别是巴伐利亚共和国^②的建立是相一致的。

尽管如此，这种理论看法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有所改变，它

① 后面，我将回过头来再谈由此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推迟了工业化和逐步发展的农业集体化。这种灾难迫使斯大林派在1928年以后实行了加速的全面农业集体化。

② 参看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特别是奥托·诺伊拉特的《社会化的实质和道路》，1919年慕尼黑版。

更多地不是为了维护战术上的转变，而是出于对现实的更好的了解，是为了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①。

在农业（基本上是私有的或合作形式的）和工业之间，就象工人和国家之间一样形成的金钱和市场关系似乎最适合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

参加二十年代苏联经济大辩论的人对这一具体经验的客观原因和理论解释认识得不够清楚。斯大林取得彻底胜利后客观的理论研究全面地被辩护士式的实用主义所代替，再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了。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式的词句，即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磨灭的法则”，它是两种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共存的结果。这种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少有相同之处，这是事实^②，几乎无需强调。

今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市场范畴的残存主要应归诸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这种状况不可能使所有产品的实物分配符合每个工人所花费的劳动。当供应不足迫使生产者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时（工资是一种能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中占有很有限的，但却可以任意挑选的一小部分产品和劳务的证明），使用价值的供应不足就使交换价值不断变化，富有活力。

消灭消费品的商品特性就意味着用详细规定的实物分配来代替工资。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交换的重新复活（先是产品本身，然后是分配券），因为需求还不能充分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的需求

① 特别是考茨基 1892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1908 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第 9 版第 158—159 页）教育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几代人，包括俄国人。

② 必须记住马克思所说的：只有独立的、彼此不相依靠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能彼此做为商品相互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7 页）。

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关系将保持，它允许采用簿记制度和较为灵活与合理的货币分配制度，并能更好地考虑到工人独立的消费决定权^①。

如果建立在真正交换，即所有物交换基础上的真正市场关系，用这种办法在消费领域中^②控制劳动力的再生产，那么在社会主义企业之间采用货币计算仅仅保持了没有真正市场关系的 market 形式。

因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费用和消费品的出售价格用货币计算，生产资料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也就比较简单的了。这些产品的生产费用显然能很容易地计算成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和货币表现形式之间的换算表格能够被用在消费品的生产费用上计算原料和机器的投入。尽管如此，这种方法也不必要地加重了计算困难，而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过程或流通现实。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市场和货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却带来一系列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相矛盾的经济和社会的必然后果。在另外一节中，我还将研究社会性的计划对商品关系这种残存的作用。

这里，我只想提几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货币和市场经济的继续存在保存了异化的所有旧形式，同时又引起新形式的产生。

市场和货币关系是产生国家和社会官僚化危险的主要根源。由于个人利益在日常生活中起很大作用，有意识地保护个人利益就有助于个人致富倾向的重新出现。如果认为市场范畴的残存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后果；如果因此认为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生

① 如果无产阶级不可能在消费方面有独立决定权，那么他们面临的危险就是在缺乏使用价值时他们的劳动将变成强迫劳动。

② 在服务行业则不是这种情况。与社会为这个目的所提供的资金相符合时，分配才能在卫生、教育、城市交通、电化、煤气和住房建设的需要基础上进行。

产力,甚至认为不惜鼓励非社会主义的动机,为了以后在物质相当丰富的基础上再开展反对追求私有制的政治斗争,那就是一种机械的、非辩证法的论证。按此方式将经济和社会过程相分离,是不可能的。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单凭“物质刺激”和“市场机制”本身就能使生产和经济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这是一种根本未经证明的看法,它至今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还必须强调,没有理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自动使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更加容易。很可能正相反,有意识地将经济管理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中将不会抑制个人主义的社会态度。如果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的话,这种倾向甚至会更加突出。苏联、东德和捷克十五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就证明了这种看法。

因此,为了避免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执行具有远见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使两种情况持续地结合起来,即:只要有必要,就持续地保留市场范畴;只要有可能,就有意识地削弱它。不应把市场范畴的消失看成是社会的“一次行动”的结果,而应看作是一种必须很早就开始的、并随着物质和知识财富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趋势。我在另一个地方分析过使市场范畴消失过程成为可能的经济条件^①。当然,这一过程将取决于有意识的关于哪些事项应优先进行的决定(关键是社会需要,而不是个人要求和生产率情况),但这种决定必须民主地由生产者自己来作出。

只有把利用市场范畴和促进它的消失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运用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日常标准才会逐步提高。否则,创建一个新社会就是空想。

^① 参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祖尔坎普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版第710页。